

西方论苏联当代文学

北京大学俄语系

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顾稚英编选

内部发行
西方论苏联当代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38千字

1982年2月第一版 1982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统一书号：10209·18 定价：0.62元

目 录

解冻	[美] 马·斯洛宁	1
回顾间隙期	[美] 乔·吉比安	22
对苏联文学的不安	[日] 江川卓	32
苏联文学界恢复名誉 ——莫斯科通讯	[法] 让·卡达拉	68
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文学 (节译) ...	[美] 戴·布朗	82
文学概况		
短篇小说的兴起		
农村作家		
结束语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文学 ...	[美] 莫·弗里德伯格	140
英美的苏联文学研究	薛君智	160

解 冻

〔美〕马·斯洛宁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结束了恐怖的统治，同时，开辟了苏联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苏联以此为转折，在非斯大林化的旗号下发展起来。在1953年内，非斯大林化尚未露头，但是，在后两年中已经多少有所显现。1956年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尤其是1958年赫鲁晓夫巩固了他的党和政府首脑的统治地位以后，非斯大林化更加强了。尽管俄国共产党人不愿意接受这一作法，但在1953年至1963年期间，苏联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生活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变革。当然，这一过程是坎坷曲折的。由于有助于消除疑惧气氛的法治的恢复，结果处决了贝利亚和秘密警察的其他头目。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以及许多职位显赫老式卫士的黜陟，表明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和拜占廷式的勾心斗角。七十五万官员被解职（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提到了这一点），以及经济上的改革激起了强烈的反抗和不满。赫鲁晓夫上台以后的许多戏剧性的事件表明，修正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之间的斗争，或者如同西方称作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实际上在对立的派别中间从未停止。每派都利用专家、内行、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作为个人的和政治斗争中的同盟者或者充当他们的替罪羊。一系列毫无休止的行动、报复、妥协、得胜和失败引起了苏联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在文学和艺术中的进退交替现象。斯大林死后的十年

里作家协会内发生的事件，与党和政府内部的变化遥相呼应。文学描绘出一幅正如西方报刊称作的冰冻和解冻的动乱的画面，反映出当时总的形势。问题在于，这些摇摆不定的现象和转折是否表明艺术的独立性增强了，对艺术的控制放松了。在这十年中，尤其是1956至1958年苏联插手匈牙利事件以后，那种迫切期待的和不切合实际希望的脆弱性就愈加明显：因为苏联制度的基本结构并没有改变。而普遍实行的仅是一些极小的让步和谨慎的改革。

人们很快就感觉到了斯大林去世的后果：大批的作家从监狱和集中营获释后返回家园，审查制度放松了，一些曾经禁止的题材也在报刊上偶尔出现，作家会议上展开热烈的讨论，知名的艺术家多年来第一次提出了一些大胆的主张。作曲家阿·哈恰图良声称“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不能解决创作问题”。爱伦堡在《旗》杂志的第十期上提醒读者说，“统计学在艺术上不能起到在工业上同样的作用”。契诃夫和高尔基想写些什么，何时去创作，这完全不受上级和作家协会的指使。各地都有迹象表明，作家们对现状以及对当代文学作品不满。

符拉基米尔·波麦兰采夫在1953年12月《新世界》杂志上发表的文章^①，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文章一开始就直接了当地指出苏联文学缺乏真诚，认为当代的许多作品就象留声机的唱片，重复着那些丝毫也不想反映真实和现实生活的陈词烂调。波麦兰采夫抱怨说，“甚至就连他们的谈情说爱，也如同在公众大会上的发言一样”。他谴责“主观性”的敌人时说：“文学史表明，作家不光是说教，而且也要进

① 即《论文学的真诚》。——译者

行自我表白”。1953年夏天，奥·别尔戈丽茨在她的“谈抒情诗”一文中认为，诗歌不可能离开作者自己个性的自我表现。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新诗《山外青山天外天》片断，尽管仍是以传统的手法写成，但已流露出“自由主义”的色彩。八、九两个月连载的费多尔·潘菲洛夫写的《伏尔加母亲河》，直接控诉了官僚主义和“僵化的”党内老爷们。他们不顾平民百姓的住房状况，而是盖起了豪华的政府大厦。小说的主人公大声疾呼：“忘掉那些计划吧，多想想人民的疾苦”。潘诺娃的《一年四季》，把一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描写成一个利己主义分子和畏罪自杀的投机分子。该作也暴露了苏联青年的道德观念混乱，以及父辈与子辈之间出现的裂痕。马雅可夫斯基的剧本《澡堂》，在消声匿迹廿五年后再版了，而且于十二月六日在莫斯科讽刺剧院上演，这是所有变化迹象的高峰。

1954年这新的一年，是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进行激烈冲突的气氛中到来的。“保守派”仍然把持一切的行政要职，他们向波麦兰采夫、潘菲洛夫、奥维奇金等人发起猛烈的进攻。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毫不掩饰地报导了外省和农村生活的贫困和痛苦。因此，斯大林主义分子企图进行倒行逆施的种种努力，常常落得毫无结果。

例如，自由派反对“官样文章”的运动一直轰轰烈烈地持续着。它特别表现在公众对一批新上演的话剧的赞扬。列昂尼德·佐林的话剧《客人》，暴露出官僚主义者的道德败坏。老基尔皮佐夫是个理想主义者，一位正直的革命者，他的儿子彼得则是一个利欲熏心的“老爷”，高高在上，是位特权统治阶层的典型代表。他的孙子是位“浪荡公子”，新

一代人中一个游手好闲、骄傲自大的人。该剧只演了二场就被禁止。但是，紧接着就出现了一桩轰动一时的文学事件。爱伦堡的《解冻》第一部在《旗》杂志的五月号上刊登了（第二部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份刊出）。而且，这个中篇小说的标题成了整个这段时期的象征。尽管《解冻》并非一篇杰作，然而它被成千上万的读者争相传阅。这是因为该作反映了人们在长期的暴力统治以后，希望有一个温暖的气候。读者如此醉心于这部作品，所以，当9月22日它以单行本发行的时候，在莫斯科当天就被抢售一空了。

《解冻》并没有着意去描写工农业上取得的成就，而是写了爱情和个人幸福的问题。小说中几对夫妇的共同特征，就在于他们不能互通情感，然而也不顾受本能力量的摆布。作为强权和高压时代的产物，他们都似乎僵冻了，害怕开诚相见，更不敢择其所好。清规戒律的废除，不幸的苏联人民感情上的解放，象征地反映出俄国的解冻。普霍夫的剧本也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一位循规蹈矩的画家，他笔下是欢笑的少先队员和快乐的挤奶姑娘，所以他得到了酬金和公认。当他偶尔遇到一位在隐居中挨饿的真正画家萨布罗夫以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败。为了混饭而粗制滥造的普霍夫和萨布罗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读者认为一些半公开的艺术作品的出现，其目的是要求全面修改已经通行的审美教条。还有一些典型的事件，更使得《解冻》流行开来：如秘密警察一手策划的众所周知的“医生阴谋”一案，老一辈人在监禁和流放十五年以后返回家园，反犹太主义有所抬头，以及其它各种莫名其妙的举动和错误的行径。小说及时的政治影响，很显然弥补了它文学上的明显缺陷。作品缺乏深度，性

格雷同，结构松散，而且它的风格是新闻报导式的，具有爱伦堡的黑白截然不同的写法特征。但是作为在一个特殊历史阶段中具有重大思想意义的小说，它仍然是这段时间的记录，也是俄国五十年代中期经历过一段混乱时期的见证。

斯大林主义分子在党的统治集团和文学组织中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当《解冻》（还有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刚一发表，他们就发起一场反攻。5月份，诗人和官员苏尔科夫在《真理报》上抨击波麦兰采夫，认为他“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修正了党的1946至1948年的决议”。换言之，这些顽固派在继续捍卫日丹诺夫主义。六月份潘菲洛夫被解除《十月》杂志主编职务。八月份特瓦尔多夫斯基被解除《新世界》杂志主编职务（因为该杂志刊登了阿勃拉莫夫，谢格洛夫和里夫希茨等人的有害的评论文章）。包括尼古拉·维尔塔在内的四名小说家和剧作家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爱伦堡，波麦兰采夫，潘诺娃和左琴科遭到“公开批判”；维克多·马克罗索夫也“因他对创作工作漠不关心的态度”被踢出音乐家协会。这些谨慎的措施都是为了抑制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知识界中日益增长的骚动情绪。这次代表大会于1954年12月召开，这样的会议二十多年来还属第一次。光这一事件就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政府隆重地接待了与会代表，这表明了克里姆林宫愿意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

但是，暴露在代表和观察家们面前的大会上的争论，更具有重大的意义。如同苏联所有的公众集会一样，大会按老一套的程序进行——援引列宁的词句，背诵共产党的一些信条，国家的高级牧师的布道，还有主持仪式人的那种神父式

的玄言妙语。但是，在这精心设计的表面的背后，却是一片争吵和混乱。而且，能够听见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前的隆隆的雷声。既然给作家讲话的机会，那怕这种机会极为有限，代表们还是发泄出惊人之多的抱怨，但也做了“自我批评”。来自南斯拉夫的客人马林·弗兰尼谢维奇说：“作家不应当也不能用同一种方法去思维。”有几个题目成了十天讨论的中心。会上几乎一致谴责了文学上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我们苏联作家协会，”凯特玲斯卡娅说，“好象是国家的一个部，它与部的不同之处是诗人和小说家任部长，这些人没有作行政工作的能力，况且他们仍然留恋自己的写作。”奥维奇金建议尽量少开些讨论如何探讨生活、如何写作的会，而是要多深入生活，多创作作品。对于当前的小说，也同样明确地指出其内容的虚假和艺术上的欠缺。发言人出于谨慎，没有批判教育艺术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那套神圣的理论。但是，他们把矛头对准了读者数量不断增加，而供给读者的文学营养品不足这两者之间的脱节现象。1954年，苏联印刷了二亿三千一百万本小说，一位“修正主义分子”说，苏联共有三十八万个图书馆，喜欢读书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往往是头版印刷的小说，在一周内就销售一空。可是，读者在这些大量的印刷品中得到的是些什么呢？“公家的房屋油漆成金黄色，工厂的车间象个实验室，集体农庄的俱乐部宛如宏伟的大厦，这是一个由舞台道具和华而不实的装饰品组成的世界，住在其中的是蜡制的原始人和蜡制的娃娃。”这便是爱伦堡笔下对当代文学的描述。诗人卢戈夫斯科依批评那些粗制滥造的作品。那些作品虽然得到评论界的颂扬，而且获得国家奖金，但实质上那些作品内容虚假，毫无价值（西蒙

诺夫称这类作品是“糕饼铺捏出来的东西”）。 “文学应当回到伟大的人性的问题上来，” 卢戈夫斯科依说，“我说的是每个人所共有的崇高而永恒的东西。嫉妒和背叛引起的不幸，对友谊和爱情的失望，失去亲人的悲哀，所有这些对于我们，对整个人类都是存在的……在我们的小说中，这些东西哪里去了？我们面前看到的是陈规俗套的阴影，冷酷，不容反驳的陈腐的概念，以及各种愚蠢荒唐的东西。”

当大会到最后起草决议的时候，这些持不同观点的声音，当然就被共产党人惯用的胡言乱语所吞没了。可是，作家们仍然认为文学落后于苏联社会迅速发展的形势，它也没有满足读者急速增长的精神需要，没有塑造出有意义的当代人物的形象，而且许多作品还否认当代的矛盾和存在的困难。

作家要求扩大“许可范围”，要求在选择和处理题材方面得到更大的自由。而且他们还要求放松官方的控制。就某种意义来讲，这次代表大会起到一种催化剂的作用。诚然，这次大会并没有动摇党继续对文学的控制和保留苏联作家协会组织机构的决心。但是，另一方面，作家们放心的是，今后他们将会受到较多的谅解，他们的错误不至于被看成是反对国家的罪行，不再有被捕和迫害的威胁，而且从此以后，文学能够自由地“反映苏联生活中仍然存在的冲突和矛盾”。一系列的事实好象进一步证实了官方的态度。特瓦尔多夫斯基，潘诺娃，克芬斯曼和其他一些过去受到严厉批判的作家被选进作协新的理事会。安娜·阿赫玛托娃也恢复了作协会籍，并且公开地参加了这次大会的各项活动。但是，大会引起的后果十分引人注目。马林科夫的垮台，非斯大林化运动的深

人发展，苏联制度的人性化在全国都能感觉出来。在文学方面，1956年2月21日《真理报》上刊登了米哈依尔·肖洛霍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苏联文学的这位德高望重的作家请求代表们不要太注重那些统计数字。苏联作家协会是“由三千七百七十三位持笔写作的会员组成的，这一事实既不会让大会感到吃惊，也不可能使他们由此而高兴”。因为作协成员中有一大批“死魂灵”。况且，前几年出版的成批书籍也决不能证明苏联文学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们应当认识到，”肖洛霍夫说，“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我们创作出有教益的优秀作品微乎其微，但是却抛出了堆积如山的糟粕之作。”他认为这是作家脱离生活和脱离群众造成的结果。但是，他的矛头所向是苏联作家协会。这个协会，肖洛霍夫说，曾经想办成一个从事创作的团体，然而却演变成一个行政的组织机构。一位权力欲很强的总书记亚历山大·法捷耶夫一手把持了这个机构。他什么事情都干了，就是不帮助作家写作。“在过去的十五年期间，为什么没有人去告诉他，说作家协会不是部队，当然也不是监禁所，所以没有作家愿意在他这位总书记面前‘规规矩矩地站着？’散文作家不去请教法捷耶夫如何写作。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写作方法，自己观察世界的角度，自己的风格。而法捷耶夫不可能也不是一位确实可靠的艺术上的权威。同样，诗人也不会去找苏尔科夫这位新的书记，去向他请教如何写诗，因为他不理解管弦乐队不仅仅是由鼓和打击乐组成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文学领导。作家中没有人找这样的领导去解决创作的问题。”

肖洛霍夫咄咄逼人的言论当中，可能有一点击中了法捷

耶夫的痛处：“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他无论是作为总书记，还是作为作家，什么也没有干。”作为官僚主义者的法捷耶夫对文学进行了独裁的统治，但是，身为作家的法捷耶夫肯定已经意识到，他遵照克里姆林宫的旨意修改了《青年近卫军》，结果把这部作品搞得支离破碎，而且也违背了他自己的原意。斯大林去世以后，法捷耶夫的党内职务下降了（他从一位正式的中央委员降为后补委员）。但是，他的失宠和过度的酗酒并不是他彻底垮台的唯一原因。无数的怀疑缠住了他的头脑。他曾追随斯大林，竭力控制作家，参加所有清洗知识分子的活动。这些都干得对吗？所以，当秘密档案公布于世的时候，莫斯科谣传着有文件证明法捷耶夫告发了巴贝尔，基尔松，可能还有其他的作家。法捷耶夫一生的活动都遭到了怀疑。这位起草了无数决议和指示的人物，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写出一部好的小说来。在这悔恨交加的时候，对法捷耶夫来说，用子弹结束生命比那种欺骗的生活更加可取。

1956年5月13日，法捷耶夫自杀了。这件事情震惊了俄国整个文坛。但是，报刊上除了写到“因病”去世以外，对他的悲剧没有作过任何解释。而且在标准教科书中（如1961年出版的半官方的《苏联文学史》，第三卷），也只简单地提了一句，“他死于”某年某月。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它对非斯大林化做了最后的奉献，并很快地被国内外获悉），对苏联作家是一个鼓舞。五十年代下半叶出版了大批生气盎然，妙趣横生的作品。纵然这些作品并非杰作，但与日丹诺夫时代的作品相比，它们还是略高一筹的。

佳作之一便是维克多·涅克拉索夫在1954年发表的小说

《在故乡的城里》。主人公是一个青年军官，他从前线归来，发现自己的妻子已随他人。他身衰体弱，流离转徙于断城危廓的废墟之间谋寻生计，孑然一身，受尽了磨难。他只好在一个医院里长住下来，尽力使自己适应平民的生活。故事几乎没有什么情节。它叙说了普通人之间的关系，人们有各自的悲欢离合，他们缺粮短柴，但却渴望着人间的温暖、慈爱、交往以及安居乐业的小康生活。小说对普通苏联男女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作了现实主义的描绘，具有抒情的细节，柔和的语调。这篇力作与几年前按照框框写的“英雄史诗”是多么不一样。共产党的批评家们对这样一部书极为恼火，但是，读者们却不予理采，《在故乡的城里》一书的销售量达一百五十万册之多。

1955年的重大事件，是对一批已故作家进行平反。他们曾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被清洗，他们的作品甚至姓名多年来一直严禁提及。平反名单中不仅有巴贝尔，布尔加科夫，米雅霍尔德，维莎里，克申（于1937年被定为“托洛茨基分子”而处决）；还有山隘派成员，如伊凡·卡达耶夫；“冶铁场”诗人，如基里洛夫，格拉西莫夫，巴赫米杰夫；反犹太运动的罹难者，如葛罗梯尼和帕格尔松（于1952年被处决）；一批在三十年代后期逮捕和清洗时被囚禁或处决的共产党员作家，如柯尔卓夫，雅申斯基，谢列勃列科娃，以及其他一些人。原先只准少数人知道的小道消息现在在报刊上透露出来了。然而却没有说明蒙难者的详细情况：他们是枪毙的，还是被绞死的，是毒打致死的，还是死于牢狱和监禁地的？他们被指控犯了什么罪，受过审讯没有，他们被“清洗”的情况又是如何？关于遇难作家的报导只是个通告，含糊其

词，这不过是隐瞒或掩饰骇人听闻的真相而已。

与此同时，平反的目的是要“死后返归”。组成了专门的编辑委员会出版“死者的文学遗产”，重新印刷发行他们的一系列作品（然而也有例外，如没有出版皮尔涅克和查苗廷，蒙得尔斯台和葛米列夫的作品）。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同巴维尔·华西里耶夫（1910—1937年）的诗歌，还有安吉洪·维莎里的小说都一起重新发行。此外，深受苏联作家（特别是帕乌斯托夫斯基、利金、卡达耶夫）崇拜的移居国外的伊凡·蒲宁的小说，在稍作删节以后大量印刷，以飨苏联读者。其他一些侨居国外死于异乡的作家（除列维托夫和查苗廷以外）作品也偶尔在刊物上发表。尤为可观的是官方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俄国伟大的古典作家，并在其逝世七十五周年时出版了他的选集。尚存者也归复了原位：奥列沙从中亚回到了莫斯科，查波尔斯基的作品重新发表，安娜·阿赫玛托娃在《文学报》上被誉为“俄国诗歌天才的和卓越的创始人”。

对那些从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以来被查禁的作家的平反，提出了他们在俄国文学中的地位问题。这当然引起了一场争论：对于教条主义者曾认为是沙皇资本主义传统的流毒蔓延而加以摒弃的那段时期，现在应如何实事求是地作出评价。1956年，西蒙诺夫在莫斯科召开的文学教师会议上竭力主张，平反之后就一定要修改文学史；在对待革命后的散文和诗歌的问题上不能忽视象巴贝尔、奥列沙、阿赫玛托娃以及其他一些由于政治原因而湮没无闻的作家。

文学上的“新面貌”也明显地表现在对待西方文学态度的变化上。海明威的著作受到指责已有十五年之久，现在，

他和他写的《老人和海》又回来了。其他一些欧美作家的作品也被翻译出来刊登在新创办的《外国文学》月刊上。其它一些新杂志（《涅瓦》，《青春》），各种出版单位，文学小组，非正式的集会，对吸引成千上万的读者的畅销书的公开讨论，以及出自青年作者之手的小说、故事、诗歌的不断增长的数字都标志着文化的复苏。引起巨大反响的是丛刊《文学莫斯科》。第一集发表了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论莎士比亚作品翻译的文章。第二集辑有玛利娜·茨维塔耶娃的诗，她是一位杰出的旅外诗人，于1939年回到苏联，1941年自杀。此集还收录了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构思的小说和几篇锋芒犀利的小品文。剧作家亚历山大·克朗在其中一篇里写道：“作家是创新者，他为未来而写作。但是，低垂着头是看不到前方的。”然而，《文学莫斯科》第三集却从未问世。

毋庸置疑，到1959年为止，苏联文学的大部分作品突破了官方的模式。变化所涉及的面相当之广，其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在作品风格之迥异，情节之构思，结局之自如方面尤为显著。象由斯大林分子的恐怖行为而造成的个人悲剧这样一些危险的题材现在也提出来了。五五年至五六年以后，被无故定罪的共产党员，从流放归来的非党员囚犯，父母在夜间被秘密警察带走再也没回来的儿女们的遭遇开始进入苏联小说。从加林娜·尼古拉耶娃的《途中的战斗》、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的《不单是为了面包》到尤里·邦达列夫的《寂静》、维克多·涅克拉索夫的《季拉·捷尔格拉芙娜》、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列昂尼德·帕沃斯基的《野蜜蜂》这样一些六十年代的小说（这里列举的仅

仅是一小部分)，把昔日囚禁在集中营中的人们的情況和追憶骇人听闻的非法逮捕的情景都一一写了出来。

批判地再现生活这种总趋向，是反对虚伪的颂扬和反对“粉饰”现实的反映。新老作家争先恐后地揭露现存制度的缺陷，只是在极少的情況下他们才影射到这种制度的根本弊病。

这种文学的主攻目标是丧失了革命思想的官僚、新的统治阶级以及苏维埃的贵族。有几部写这种题材的短篇小说如此直言不讳，以至使它们所获得的成功似乎与它们的艺术价值不大相称。在《个人的意见》一书中，丹尼尔·格拉宁描写了一个不敢发表自己意见的工程师，某研究所所长，他是一个懦夫，宁可背弃真理而不愿与上司发生纷争，唯恐丢掉自己的高官厚禄。尼克拉·日丹诺夫的《故乡之行》，写一位农民世家出身的高级官员探望自己的故乡，发现村民艰难竭蹶，一贫如洗，他大为震惊。于是便匆匆离去。哥查科夫和其他一些作家也重复这样的题材：衣锦还乡的儿女们看到落后的村民们说话不离党的口号，但过的却是原始的生活，他们感到城市居民和这些农民之间有着一条鸿沟。在亚历山大·雅申写的《杠杆》中，集体农庄的领导干部只是在私下才敢说几句真话；他们抱怨那些党的老爷们，因为他们从城里一下车就叫嚷“贯彻执行”的口号，只对徒有其表的高指标表示关心，而对人民的生活却不闻不问。然而，一开大会农庄的领导们自己也是重弹老爷们说过的陈词烂调——因为在苏联制度的机构中，规定他们只能起“杠杆”的作用。雅申（1913至1968年）兼擅抒情散文，1962年发表的《沃洛格达婚礼》，极为生动地描绘了俄罗斯北部的古风旧习和民间

传说。

1956年2月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赫鲁晓夫直接攻击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标志着在社会批评文学中的分水岭。同年秋天，《新世界》连载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1918—)的《不单是为了面包》，揭露时弊的文学达到了高峰。这部小说就纯粹美学标准而言，并无很高的价值：结构松散，叙述冗赘，风格平淡，但却轰动一时，掀起了狂热的讨论，招来了数以百计的文章。在苏联作家协会会议上，有诤难而攻之者，也有辩驳而护之者，这在党和政府的会议上也成为议论的话题。象《解冻》一样，该作表达了人们共同的思想情绪，反映了苏联社会的整个倾向。赫鲁晓夫在一次讲话中把杜金采夫斥之为“诽谤者”，说他“在一部不健康的、有倾向性的、令人生厌的书中幸灾乐祸地描写苏维埃生活的阴暗面……”但是，他无法解释为什么这样一部劣作竟然使千万读者着迷，为什么在如此长的一段时期里依然是大家注意的焦点。

《不单是为了面包》情节曲折复杂，但主题简洁明了。小说围绕洛巴德金展开，他原是物理教员，战后成了发明家，设计离心铸管机。洛巴德金子然一身，专心致志地扑在工作上，不参加任何“帮派”，没有“正当关系”，在名流专家的心目中似乎是一个蠢货废物而已。由于官僚作风，他的设计被束之高阁，而他陷入了贫困、孤单的境况。他所得到的唯一支持是来自他的劲敌德兹洛夫的妻子娜佳，还有一个败下阵来的怪人。洛巴德金的发明有一点为军方所注重，但这却给他带来了“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他遭到逮捕并被送到北极的集中营。由于一位正直的法官怀疑此案不